

最近偶然得到两本书，一本是林京、王庆祥编《末代皇帝：溥仪影像全析》(简称《全析》)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 11 月出版；另一本是全冰雪著《一站一坐一立：一个中国人 62 年的影像志》(简称《一站》)，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年 8 月出版。两书没有任何关联。所谓“偶然得到”，就是在书店闲逛时见到，喜欢而买下来。

溥仪三岁以兼祧同治、光绪两帝的名义即位，仅三年即退位。在紫禁城闲居修学十多年后，被冯玉祥赶出。流浪多年，在长春伪满洲国先任“元首”执政后称“皇帝”年号“康德”，成为日本人的傀儡。抗战结束，他被苏联人所俘，后归国接受改造。晚得特赦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，病故时年仅 61 岁。一生大起大落，曲折离奇，为今人所熟知，更多人愿意作更深入的了解。中外拍过他许多电影与电视剧，他自述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今人续写的《溥仪的后半生》，都卖得很好，原因即在此。

摄影技术传入中国，应在 19 世纪中期，可惜同治、光绪两帝留下图像太少，慈禧留存照片也多是最后十年所摄。溥仪是唯一留下数量巨大图像的皇帝。《全析》正文 738 页，全文字部分不足 50 页，一页有二三图的约占三分之一，全书收照片近千帧，虽不能说溥仪存世照片已搜罗无遗，但收集宏富，大端完备，是可以确定的。

全书分《从人到龙》《宣统逊位》《龙凤呈祥》《国中之国》《驱逐宫禁》《津门行在》《伪满皇宫》《深宫情仇》《伪满败亡》《从龙到人》《公民人生》11 个部分，囊括溥仪

■ 濠上漫与 ■

皇帝与平民的图像史

■ 陈尚君



一生的所有场景。以我的孤陋寡闻，如溥仪即位前在醇亲王府的留影，醇王家族几代人的留影，以及溥仪即位后与父亲合影而标有“大清国宣统皇帝陛下及摄政醇亲王殿下御尊像”，以前都未见过。全书的最后是华龙皇家园林内溥仪墓改造前后的景象。

以如此大的篇幅，巨细不遗地收集溥仪一生照片，既看到他在紫禁深院中的孤独成长，也看到数度婚姻中的私密瞬间，更看到他到与军政各种人等的来往，从满洲国执政到皇帝的重重恶行，最后则是经历改造、重回人间的

甘苦随和。溥仪的一生是近现代史的缩影。在《全析》中，好奇而外行如我，可浏览他的平生行迹，专治近现代史者当可从中读出仅凭书面文献可能忽略的细节。《全析》的解读稍显简单，可解读的图片仍有疏忽，但能臻此已经很不简单了。

《一站》的主人公叶景吕(1881-1968)是福州富足的小商人。他 16 岁时随清王朝驻英大使的同乡罗丰禄，在伦敦度过五年时光。归国前夕他在伦敦相馆摄影留念，时年 21 岁，这是他留下最早的照片。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即溥仪即位前两年开始，

他每年都盛装到相馆拍一张全身照，一直坚持到 1968 年去世当月。从 26 岁坚持到 88 岁，其中大多是一年站立，一年侧坐，姿态从容，面相安详，一直保持感染过英国绅士仪态的中国民间商人的中和形象。

叶景吕的生平极其简单。他从未参政，从民元开始，一直为罗丰禄家族经营当铺和茶庄，直到抗战军起。此后似长期赋闲。他经历数度鼎革，内心并无太大的波澜。满清逊位，他在当年照片上写“民国元年，奉行新历，时 1912”。1949 年，他的年度照片作斜坐读报状，题记：“公元 1949 年十月一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。”唯一的一次是在 1952 年，他没有留照，而是请人剪了一张黑纸剪影，自题云：“一九五二年，在余为污浊之年，故特用黑纸剪影，以资敬惕。一为长子加入老母道，余被牵连，受取缔。二在五反时，被长孙检举，曾代亲友售金。以上两事，虽经登记坦白免究，然总以生平无作恶贪污，而壬辰年虚度七十有二，蒙不洁之罪名，殊为憾事，并志悔过不忘之意耳。”从中可见一位平民对自己一生道德行为的要求。

叶景吕很普通，但又很不寻常，他用 62 年坚持留影，留下个人一生几乎完整的生命史，中外都很少见。从这些照片中当然也可看到国事蛸唐中，普通人的从容镇定，温良自守。

叶景吕的故事在他身后方引起世人关注。他生前将一生照片珍藏成册，他家子孙也一直珍藏。2007 年老家搬迁时，不慎遗失，后在网上被高价拍卖。叶景吕去世第二年方出生的老照片收藏者全冰雪，发现这些照片的线索，感觉到其价值，出资买下，进一步研究，得以还原叶景吕的生平，且得到叶家后人的积极支持。这些照片从 2008 年公开以后，在中外许多影展展出，引起广泛轰动。

我写这篇短文，是想说明，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是历史，小商人叶景吕的一生也是历史。几十年来许多老辈凋零，旧家分析，无数的日记、书信、照片散落民间，能否为有识见者发现研究，真是几率不大。复旦的旧宿舍以前做过日本军营，有朋友搬进装修时，发现夹层中有大量日文书信，等我听说时，早就扔掉了。叶景吕真幸运，他的照片没有拆散，且被有识者所得，进而能成为这一长时间段中的生命记录，真很幸运。

我也特别赞赏《全析》的整理出版。特别要说明的是，从西人携相机进入中国留下图像开始，早已超过一个半世纪。私人相机普及以前，有关历史重要人物、事件、古迹、山川的影像，都有必要做完整的清理与科学的鉴别。如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袁世凯、孙中山等人物，都应编刊完整的图像志。我以前也看到不少类似图书，但大多图像不清晰，说明也较含糊。《全析》搜罗很富，但没有收藏所在和摄影者的记录。

清末或民初旧影，应该有更权威完整的整理。

(上接第一版)

收购姚师字画以志怀念

王伯群在《〈弗堂类稿〉跋》中表示：“其生平题画诸作，亦颇隐寓感慨。散佚居多，异日当搜罗补刊之。”由于政务繁忙，王伯群未能再为姚华文集补刊。但他遵守诺言，开始了漫长的收集购买姚师书画之路。

每收购到姚师作品，王伯群都要详细记载收购过程、心情、份数和款项等。譬如，1932 年 3 月 19 日载：“李吉甫携姚茫父篆书联一付，有草书跋语，以二十元购之。觉茫篆书联不多见，此联尤精彩，可喜也。”两天之后的 3 月 21 日，购“姚茫父篆书联两付四十元。”翌年 1 月 3 日，“与访古斋周介之议价，购姚茫父花卉四条。”

1933 年，王伯群曾两次赴北平公干。第一次是 4 月 21 日至 25 日，政务军务繁忙之余，他抽空二次寻购姚师书画。4 月 18 日记述：“看碑帖，得范式碑一册、衡方碑一张，均为姚茫父故物。”4 月 22 日载：“姚盦来，赠姚茫父画山水一张，行书楹联、符缩印红崖碑两张，风画集一册。”

第二次是 6 月 22 日至 8 月 12 日。王伯群被推选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。在该会委员长黄郛再三催促下赴北平出席会议，商讨对付日本入侵策略，救济东北难民，兴修河北水利等。其间，王伯群抽暇到琉璃厂访荣宝斋、悦古斋等，搜寻姚华作品。

王伯群搜集姚师作品，几乎到了痴迷程度。一次，字画商孙琚之送来姚华旧藏《小字麻姑仙坛记》，王伯群见之如小孩看到糖果般开心，连续三天详述他见到旧藏物时的经过和流连忘返的心情。

第一天，孙琚之送来颜真卿《小麻姑仙坛记》，王伯群爱不释手。“姚师校为南城原石，南宋拓本，虽裂，稍宽拓已晚，然字细而精神挺拔，所谓圆到有余者也。”他觉得此小字帖颜书可爱，虽曾见过何子贞藏、张叔未跋各本，但究系珂罗版，远不如拓本之出神。何况此为南城原石，又经姚华详考数十遍，而实爱终身之物。王伯群“为之狂喜不值”，但唯孙索价五百余金，觉得殊属太贵，又正值财务恐慌之际，遂命孙留观再说。入夜，王伯群又取小麻姑颜书再与何子贞藏三册对校，又细玩姚华精跋数过，最后认为如此宋拓本如不收藏，机会一过，不可再来。他计算自己钱包，匣中尚存平票三百数十元，加以上海银行余款，有数千元，收藏当无不足，遂决计收购之。

第二天上午，孙琚之来，王伯群当即留《小麻姑仙坛记》一册，姚篆八尺联一付，姚画摺扇故乡风景一柄，画菊八页，姚分书“今夕只读风月”横披一个，补亡双碑一册。下午，荣宝斋来，以姚书篆三联，姚画挂一幅等交之装裱。

第三天下午，孙琚之来，告王伯群已将姚遗墨全数送交荣宝斋，“内中有一姚、陈(师曾)合作端节景物手卷，长丈余，大观也。索百元，而余未收见之，又觉可惜，傍晚特往该斋一览。”由此观之，王伯群欲收藏留存姚师书画之心切，对收购姚师作品到了何等痴迷和沉醉的程度。

传播姚华的思想

姚华离世，传播姚华的思想成为王伯群的使命之一。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敬思曾感叹：“惟先生能尊师。先生尝慨然

为业师姚茫父先生刊《弗堂类稿》，且以持赠友辈，艺林至今称美，其笃念师长实足为今世楷模。”

王伯群赠送《弗堂类稿》的对象，主要是两类友朋。

一类是贵州乡贤。如军政部长何应钦，交通部次长李仲公，贵州省长卢焘、王家烈，以及画家邱石冥、文物收藏家申彦丞等，以弘扬黔省大儒，笃念师长。

1931 年 12 月，王伯群接待二十五军军代表王家烈，相谈黔事后，送赠“《弗堂类稿》一部和王文华墓碑十份”。不久，王家烈在王伯群运筹下，被任命为贵州省长。

1932 年 2 月 5 日，王伯群取《弗堂类稿》“亲携至何应钦处赠之”。4 月 10 日，王伯群接待北京京华美专校长邱石冥等来访，王赠《弗堂类稿》。7 月 4 日，在与文物收藏与鉴定家申彦丞谈川事后，赠《弗堂类稿》。

1935 年 12 月 8 日，王伯群与李仲公、卢焘商讨组织成立西南实业公司，计划先稍投资，以坚人民之信仰，然后发展至政治计议。商谈结束后，赠卢、李《弗堂类稿》各一部。可见王伯群赠予《弗堂类稿》者，皆为他器重信任之黔省乡贤。

另外一类是赠送友朋。如民国大员与名流硕学吴铁城、黄郛、韦作民、吴鼎昌、鲁荡平、陈石泉、金仲荪、符矩存、章士钊、汤漪、何其巩、柳貽徵等友辈，宣扬姚华精典，正可谓“饮其流者怀其源，学其成时念吾师”。

1932 年 3 月初，王伯群赴洛阳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时，受蒋介石所派，赴北平会见张学良，相商中央对东北伪满洲国态度，请各友邦主持正义事宜。行旅中，3 月 17 日，王伯群“以茫父先生文集一部送韦作民，一部托伊送吴鼎

昌”。3 月 21 日，“以弗堂文集一部分送鲁荡平、陈石泉”。3 月 22 日，以“弗堂集一部赠金仲荪”。

4 月 5 日，回到南京的王伯群，嘱秘书取《弗堂类稿》50 部回家，清理一名单嘱其分送。4 月 10 日，王伯群赠吴铁城、黄郛、宋述樵、何纵炎各一部《弗堂类稿》。4 月 12 日，接待符矩存，谈上海轮船招商局事后，赠符《弗堂类稿》。5 月，国民政府为团结西南三省，特派王伯群以“川滇黔视察专使”前往巡视。结束巡视后，自重庆回南京船上，遇太虚法师，王伯群诺以《弗堂类稿》相送。“太虚出其两次入川所赋诗……不乏佳构，毕竟不似他僧之浅学寡识……余以《弗堂类稿》一部赠之，渠通信上海东有恒路雪窦寺南立中山东路佛学社。”即使生病期间，他也不忘推广姚师文集，曾专赠前来视疾的章士钊、汤漪两位好友，他记载曰：“仲文、斐予两君来谈久之别去，各赠与弗堂集一部”。

1933 年 7 月的一天，北京市市长何其巩前来拜访，王伯群赠以《弗堂类稿》谢之。1934 年 1 月，王伯群与何应钦秘书长杜惕生同访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貽徵，送《弗堂类稿》两部，并托其辨别归叶山房的《史记》是否宋本。

王伯群不仅把姚华《弗堂类稿》赠送朋辈，同时，也把文集当成自己案头读物，把姚师的著作思想化为自身的学识修养。抗战时期，王伯群率大夏大学远迁贵阳。一次，他手书一联语赠当地书法家陈恒安，联云：“昼了公事夜接诗人得句皆堪作图画；修楔虹桥访碑神智此才真不负江山。”陈很好奇，问为何能写出如此生僻的联语？王伯群答茫父先生曾写过，故记忆深刻，信手拈来而已。